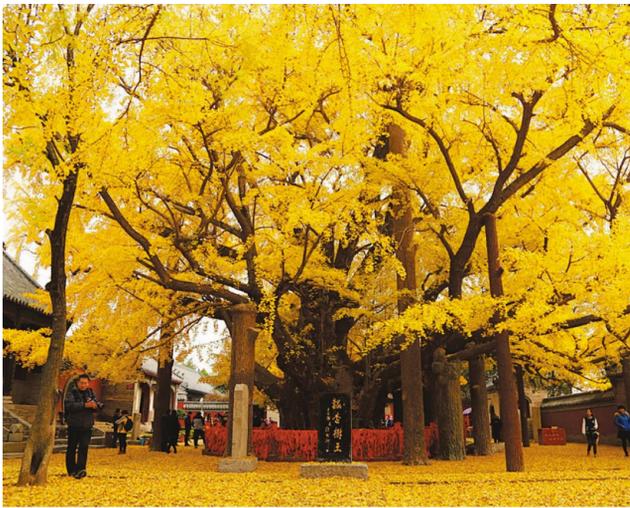


2015年全国社会保险基金决算公布 年末滚存结余 5.89 万亿

2015年全国社会保险基金决算的报告已报国务院同意,财政部公布了相关数据。数据显示:2015年,全国社会保险基金总收入46354亿元,比上年增长14.6%;总支出39118亿元,比上年增长16.1%;本年收支结余7236亿元,年末滚存结余58893亿元。

从分项情况看,2015年,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26554亿元,比上年增长3281亿元,增长14.1%,完成预算的109.2%。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2879亿元,比上年增长536亿元,增长

22.9%,完成预算的104.6%。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8926亿元,比上年增长1072亿元,增长13.6%,完成预算的107.6%。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5405亿元,比上年增长928亿元,增长20.7%,完成预算的104.6%。工伤保险基金收入729亿元,比上年增长58亿元,增长8.6%,完成预算的102.7%。失业保险基金收入1365亿元,比上年增长15亿元,减少1.1%,完成预算的97.4%。生育保险基金收入496亿元,比上年增长57亿元,增长13.0%,完成预算的108.5%。人民日报



山东日照浮来山“天下银杏第一树”迎来秋日盛景

“天下银杏第一树”,在山东莒县浮来山千年古刹定林寺内,高26.7米,干围15.7米,遮荫覆盖面积900平方米,盛夏时节每天需要吸收2吨左右的水分,还有“银杏树王”和“活化石”之称。据《左传》记载:“隐公八年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来。”由此推断,此树树龄应该在4000年左右。

定林寺始建于东晋,兴起于南北

朝时期,距今已有1500年的历史,寺内三教堂供奉儒、释、道三教,是山东省现存唯一一座三教寺。寺内校经楼为中国历史上的文学理论家、文学批评家刘勰校对《文心雕龙》所在地。定林寺总面积4900平方米,寺院面积虽小,可是却包揽了一处世界之最,就是名誉中的“天下银杏第一树”,同时还有“银杏树王”和“活化石”之称。 人民网

长征中的“女神”

“她们是我们心中的‘女神’。”长沙市周南中学一名初中生在《长征故事读后感》中这样写道。女红军们穿越时空,成为了今天新生代心中的“女神”。

“她们没有一个中途退却的”

在江西于都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馆里,陈列着一份72年前参加中央红军长征的女战士名单。于都党史办主任曾懿华介绍说:“长征出发时,有32名女红军随军出征,其中30名最终到达了延安。”

从这份名单上可以看出,30名女红军分为三部分:一部分是中央直属机关负责人和领导干部的夫人,如邓颖超、康克清、蔡畅、贺子珍等;一部分是卫生部门的女同志,如邓六金、刘彩香、李桂英等;一部分是工作组的成员和政治战士,如李伯钊、王泉媛等,主要担负调查土豪、宣传群众、寻找民夫等工作。这30名女红军中,有5位湖南人:蔡畅、刘英、邱一涵、吴仲廉、曾玉。

这份名单是如何确定的?

当时苏区的形势已经非常紧迫了,能够跟随大部队行动对每一位女同志来讲都是一种荣耀,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随队长征就是一种安全的保证。既然是战略转移,就不可能把所有人都带走。对于女同志参加长征,中央当时规定了3个条件:一是共产党员,政治可靠;二是要有独立工作能力,会做群众工作;三是要身体强壮,能适应艰苦环境。据中国女红军纪念馆讲解员介绍,其实当时最“恐怖”的是妇女“怀孕”,“怀孕”基本上就意味着与长征无缘。

1934年9月中旬,中央妇女部部长李坚真接到中央组织部主任李维汉的命令:草拟一份随红军主力一起行动的女红军名单,要求总数不超过30人。李维汉告诉她:“组织上决定挑选一批身体好、能做群众工作的妇女干部……”妇女部先出个名单给我,总数不要超过30人。”还明确告诉她,中央领导同志的夫人在中央直属机关担任领导职务的女同志可以不考虑,由中央组织部决定;在军队工作的女同志也不用考虑,由总政治部决定。

谁去谁留?李坚真费尽心思,终于在在规定时间内拿出了一份名单。

经过严格筛选和把关,最终确定参加长征的女同志共有32人,跟随中央红军踏上了漫漫征程。

陈碧英那时和董必武新婚燕尔,她

早就做好了随队长征的准备。可体检结果出来后,因体重差了一斤,组织上决定让她留下来。最重要的是,当时她怀孕了,不利于长途跋涉。她央求董必武去说情,但董必武劝她接受组织的安排,没想到,从此后两人天各一方,再未晤面。

时任中央工农监察部委员的黄光娇,早就做好了随大部队前进的准备,检查完身体后就回驻地收拾行李。突然,她接到通知说她留下来。“为什么?”她大惑不解。原来,她已经怀孕3个月了,只能无奈地服从了中央的安排。

1934年10月16日,红军迈开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几十位女红军也离开了苏区这片相对稳定和安宁的红色土地,开始了前途未卜的长途跋涉。参加过长征的女红军战士邓六金在回忆录中写道:“尽管我们这些姐妹后来的各死异乡,有的漂泊流浪,与党失去了联系,但她们中没有一个人叛党变节的,至死保持了对党的忠诚,保持了一个革命者崇高的革命气节和坚强意志。”

“死,死在一块;烂,烂在一堆”

长征伊始,面对日益严峻和恶劣的局面,女红军们提出了一句口号:不掉队,不戴花,不当俘虏,不得8块钱。当时部队有条纪律,如果有红军在途中跟不上队伍,就会被寄养在老百姓家里,组织给其留下8块钱作为生活费。

长征过程中,女红军们与男同志一样爬雪山,过草地,冒酷暑,蹚江河,吃草根,嚼树皮……经受了生与死的考验。甘肃省古浪县红军西路军烈士陵园,巍然耸立着一座烈士纪念碑,记载着一个个可歌可泣的红色悲歌。西征虽然是红军历史上的一场悲剧,然而,西路军指战员的英雄气概却足以惊天动地,泣鬼神,而吞针自杀的吴富莲,“其悲壮堪比湘江战役中绞肠自杀的红三十四师师长陈树湘”。

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川西北懋功地区会师后,1935年8月,中央决定组织左、右两路军经草地继续北上抗日,吴富莲被调到红四方面军。1936年秋,红四方面军奉命组成西路军,西渡黄河,在河西走廊遭到了数以万计马家军的轮番进攻。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年仅24岁的吴富莲义无反顾地挑起妇女先锋团政委的重担,王泉媛被任命为先锋团团长。

1937年3月,妇女先锋团为掩护主力东渡黄河与中央红军会合,奉命佯攻张掖,钳制敌人。虽然妇女先锋团由西路军各部的千余名伤病员和疲惫不堪的女

清华学生八年读 1800 本书 每一百本写一篇总结文章

最近,清华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冯立正酝酿自己的第18篇阅读总结。从大一暑假开始,他习惯了每读完100本,就写一篇总结性的文章,并从中评出10本好书。八年来,他已读完超过1800本书。

在不少书友眼中,冯立是不折不扣的“书神”,而他在两个多月前发布的《如何让你的阅读更高效?——1700本书阅读总结》,也成为众人传阅的热门文章。

“没有100本阅读量无从谈技巧,没有300本阅读量无从谈速度”

“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读书?我也说不清楚,只记得小时候一到周末,父母就各自看各自的书,我也找本书看,慢慢地也就有了兴趣。”冯立戴着一副黑框眼镜,身材微胖的他说起话来笑眯眯的,眼神里还带着几分腼腆。

一路从人大附小、附中到人大国学院,冯立坦言自己从来都算不上学霸,大一那年甚至有些荒废。2008年夏天,忙完奥运志愿工作的他第一次认真思考大学生生活,“觉得起码应该好好读点书,不至于过得太空虚。”冯立给自己制定了400本的本科学读书计划,并在豆瓣网上注册了账号,“主要是想存个档,回头再看的时候,知道自己都读过什么,有过哪些心得。”

起初,这个人门级“书虫”一学期的阅读量不过两位数。直到研二那年,冯立意识到自己的阅读速度突然并

喷。他随后写下的《阅读的极限——900本书读书总结》,被8778人在文末点了“喜欢”。

“很多人想知道有什么技巧可以让阅读提速,但在我看来,阅读速度很难靠技巧来提升,速度快慢与个人的阅读经验直接相关。没有100本阅读量无从谈技巧,没有300本阅读量无从谈速度,但是有了700本阅读量,你也就很明白自己的阅读习惯与阅读能力,也就很自如地分配自己的阅读时间,不用去学别人体系化的阅读方法了。”

相比起速度,冯立更在乎如何把书吃透,“读懂一本书远比简单刷几个数字更有意义。”对于值得精读的书目,他总要花上阅读本身的两到三倍时间来做笔记,“在完成笔记的过程中会发现自己的不足,再辅助阅读一些书目,把书读‘厚’,这样围绕一定主题自然生发出来的阅读也胜过直接照搬动辄上百本书单。”

“与其费力腾出一大段空白时间,不如适应碎片化阅读的时代”

自从因读书多出名,冯立就常常会被问到每天究竟花多少时间在看书上,“这很难回答,因为我很少拿出整块的时间来读,平时的阅读多是见缝插针。我们的生活都注定忙碌,与其费力腾出一大段空白时间再去阅读,倒不如适应这个碎片化阅读的时代。”

只要出门,冯立的包里总要带上一本书,即使没办法带包,手机里也一定会

男生的方向感真的比女生好么?

人们总说男生的方向感优于女生,大家也经常会在生活中听到,男生在电话里指路说你应该往东、往西,女生说“我分不清楚东西,请告诉我左右。”难道女生的方向感天生比男生弱么?

方向感是一种本能,与性别无关

在自然界中,所有的生物,出门之后都会辨识方向。有一些人的方向感强,有些人的弱,但是他们一定会都会辨

别方向。据《科技日报》报道,北京大学实验团队通过对果蝇基因组实验,发现了一种可以在磁场当中定位方向的蛋白质复合体,而研究人员也在人体中找到了这种蛋白质的基因,科研人员将之命名为磁感应蛋白。

男女方向认知差异与生活环

首先,人有主观意识,每个人会因为感官、感情等主观心理认知的不同,导致对同一事物有着不同的看法。人体磁感

“是毛主席把我带上长征路的”

像大多数女红军一样,危秀英也是童养媳出身。

出生于瑞金叶坪乡一个贫困家庭的危秀英,长得十分瘦小,被毛泽东、朱德等人戏称为“矮子”,是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里描述最多的女性之一,不仅因为她“像小白胡桃一样娇小”,更重要的是她“在长征路上抬担架最多、救人最多”。

长征出发前夕,危秀英家里要把她卖了,是红军解救了她。据《开国英雄的红色往事》记载,危秀英曾感激地回忆,是毛泽东对她说:“秀英,你还是跟我们走吧,要不,红军走了你还得被卖掉。”70多年后,弥留之际的危秀英还记得那段往事:“是红军救了我,是毛主席把我带上长征路的。”

1934年10月,危秀英被编入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总卫生团干部连,当了一名政治战士,主要是照顾伤病员,分派担架,给伤病员和民工做思想工作。行军时,她随临时雇来抬担架的民工走在一起,鼓励他们跟上队伍,有时还要顶替他们抬担架;宿营时,她还要照顾民工的生活。

一次,危秀英护送刚生过孩子的陈慧清的担架追赶部队,路上遭到敌人的袭击,抬担架的民工跑了3个,剩下的一个也说没力气了,抬不动了。危秀英见情况危急,连忙将自己的半袋子干粮给了他,并说服了这位民工,和她一起抬起陈慧清前进。最终,他们翻过两座山,通过了敌人的封锁线,脱离了险境。

1935年7月,部队到达四川毛儿盖,邓六金、廖似光、刘彩香3个女战士和哨兵、通讯员误食野蘑菇中毒。危秀英急中生智,将手伸进刘彩香的喉咙去掏,让她把毒蘑菇汤呕出来。就这样,危秀英将她们一个个救活了,还用同样的方法,救了红四方面军一位团长、一位政委和一位参谋长。

类似这样的故事很多。女红军们在冒着天上敌机轰炸、地上敌军围追堵截危险的同时,还要照顾战斗部队留给她们的老弱病残。

有一次,一个双腿负伤的女红军战士走不了路,一时找不齐抬担架的人,邓六金便自告奋勇地抬起了担架。可是,大半天过去了,他们还是没有赶上部队,邓六金心急如焚。在爬一个陡坡时,邓六金的体力透支到了极点,步履维艰,大家劝她休息一下,邓六金何尝不想坐下来,但她喘着粗气坚定地说:“我们一定要在天黑之前赶上部队。”话还没说完,一口鲜血从嘴里喷了出来。抬担架的老

事先存好看好的电子书,“带书的同时要带笔勾画,不带书的话,就可以做标记并且能导出笔记的阅读工具,随时记下读书过程中的所思所感。”

即便是在拥挤不堪的地铁上,他也能找到办法读书。“我家住海淀,女朋友家在朝阳,来回路上差不多要两小时,这些时间完全可以利用起来。”去年5月,冯立专门写了一篇《在地铁上碎片化读书的窍门》的文章,“遇到比较拥挤,但站着起码还能掏出手机,坐着可以掏出Kindle或iPad mini的时候,可以看一些小说、随笔等不需要太费脑子思考的书。”赶上早晚高峰最拥挤的时候,也可以插上耳机听有声书。”

对冯立来说,长途旅行同样是读书的好时候。去年六月,他在13天的时间里游历欧洲九国,期间读完了28本颇合时宜的书。“林达先生的成名作《带一本书去巴黎》是最好的巴黎旅行文化指南。坐在草坪树荫下,找来朱自清先生上世纪30年代在欧洲旅行时写的《欧游杂记》,会发现他旅行中有几站与自己的行程重合。去意大利的路上,读托马斯·曼的《魂断威尼斯》,会对那里的文化有更深理解。”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其实是双向互动的,旅行往往能激发出读书的兴致,而读书可以让旅行更加丰富。”这些年,冯立并未因为读书而将自己封闭在书斋里,而是先后游历了12个国家以及国内120个县级单位。

“书市一年比一年萧条,少了许多

淘书的乐趣”

与许多爱书之人一样,冯立的一大乐趣便是四处淘书。

对于书店,冯立没有进行任何评分或评级,“这些书店能够坚持到今天已经很难不容易了,如果简单以此书店好不好把否了的话,这个行业会越来越萎缩,最后有一天你会发现它们就从眼前消失了。”

纵使他这般用心良苦,但四年后的今天,指南里的许多书店还是没能留下,“依然健在的大概只有三分之一,虽然后来也有新的书店冒出来,但远远小于消失的数量。”说到这里,冯立就像在谈论自己失去的朋友,话语里满是淡淡的哀伤与惋惜,“等到明年,打算再写一个续篇,把范围扩大些,对北京五环内的书店做个盘点。”

除了书店,冯立也是京城历次书市的常客。“过去在地坛举办的时候,总要提前一天就进去‘寻宝’,后来改在朝阳公园,也要在早上八点开场前守在那里,这样才有机会赶在书商前面抢到好书。”

遗憾的是,好书俯拾即是的情景已经越来越难觅,“书市一年比一年萧条,自从地坛书市停办以后,现在规模小了很多,很多出版社已经不再参加,像中华书局、中国书店这样的老牌出版社,新书打折力度不大,跟网购相比没什么优势,而旧书摊上也不再那么容易‘捡漏’,就算有不错的旧书,也是身价飞涨,少了许多淘书的乐趣。” 中国青年网

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机动车里也都装着导航设备,大家一出门只要设定好目的地,然后跟着导航走就行了。然而,时间一长,不可避免地会出现问题。因为磁感应蛋白是生活在我们身体内的物质,如果我们不用它,自然而然就会出现“优胜劣汰”的情况。所以,大家可以使用导航,提前获知路况信息,避开堵车路段,高效出行。但在生活中,我们还是在辨别方向的时候开动脑筋,使我们身体各个机能都运用起来,这样对我们身心健康都有好处。

科普中国

乡害怕了,忙说:“女人干不得这个。”伤员也说:“女同志,你不行,再等等,也许能碰上个男人……”邓六金没有争辩,抹掉嘴巴上的血迹,舒展了一下腰身,招呼老乡抬起担架继续朝山上爬去。那名老乡感动得不得了,边走边流泪,说邓六金是个罕见的坚强的女子。

伴随着激烈的战斗,经过艰苦的长途跋涉,邓六金等女战士随着大部队来到了陕北。董必武赞叹她们道:“这是许多男子望尘莫及的。”

“这个女同志不简单”

“夹金山上雪似银,脚踏冰雪奔前程。革命豪情比火热,融化冰雪步不停。”在广东丰顺县坚真公园里,一身戎装的李坚真骑着骏马,手持望远镜,面带微笑,深情地望着各项建设日新月异的家乡……李坚真铜像矗立坚真公园,在夕阳的映照下熠熠生辉。公园花岗石墙上雕刻着李坚真平生所创300首山歌中的85首,读着它们,笔者感受到,山歌中透露出的更多的是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正是对党有着坚定的信仰,对党的事业充满信心,女红军们才在这场举世闻名的长征中,焕发出夺目的光彩。”

李坚真19岁时就走上了革命道路。1930年春,时任闽西汀东县委书记的李坚真,碰巧遇见了正在福建养病的毛泽东。听说她开展群众工作和土地革命很有一套,毛泽东夸赞她:“这个女同志不简单啊!”

长征路上李坚真更不简单。中国女红军纪念馆的讲解员介绍说,中央红军到达土城时,大部分女红军编在干部休养连,李坚真任指导员。在青杠坡战斗中,一股敌人突破了红五军团的战线,干部休养连行军队形一下子被打乱了,牲口上驮着的物资和担架上的伤员,陷入了寸步难行的境地。一些民夫听到枪炮声越来越近,丢下担架和伤员逃跑了。危急时刻,“李坚真等女红军们勇敢地冲了上去……在一条土沟前,伤员们无法通过,她们就纵身跳下去,冒着生命危险把伤员驮了过去”。

“翻过一岗又一岗,夜黑行军道路长。肩抬担架闯天下,革命思想当太阳。”这是李坚真在四渡赤水战士们最疲惫时唱的山歌。“金沙江水急又深,手牵手来心连心。阶级姐妹团结紧,不怕敌人百万兵。”无论身处多么艰苦的环境,李坚真都积极开展文艺宣传,以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鼓舞战士斗志,被誉为长征路上的“百灵鸟”。

在一次与敌人的意外遭遇战中,红军主力部队已经走远了,而负责休养连安全的军委警卫营却还没有上来,休养连被暴露在一个十分开阔的地带上。蜂

拥而上的敌人见只有几位女红军护送,立刻气势汹汹地包围过来,形势万分危急。李坚真迅速集结女红军,利用手中简陋的武器一边顽强阻击敌人,一边带着其余的女红军和休养连边打边向路边的深沟里转移,以便追赶部队。不料,敌人发现了她们的意图,号叫着冲了过来。李坚真命令女红军们:“快利用附近的掩体,阻击敌人!”女红军们与敌人对射起来。有的战士忍不住,几次想冲出去同敌人决一死战,都被李坚真制止了。她说:“同志们,节省子弹,拖住敌人,为警卫营的到来争取时间。”等敌人靠近,李坚真同战士们对准敌人一起开火,敌人丢下十几具尸体,退下去了。半小时后,军委警卫营赶到了,牵制住了敌人,李坚真等才得以护送干部休养连向深沟撤去……

浙江舟山群岛的第一批共产党员、中共于都县和胜利县的第一任县委书记、中央红军中唯一一支女红军队伍的政治委员……拥有这些称号的女红军金维映与李坚真有着一样的传奇经历。中央红军离开江西后,金维映担任妇女队政治委员和党支部书记(刘群先任队长),让她们自己供给自己,自己照料自己。令人想不到的是,这支女红军队伍不但完成了任务,还成为红军与老百姓凝结亲人情谊的桥梁。

“当年的女红军们,曾在镇上的文昌宫搞了一次大型演出,宣传红军的主张。”在贵州习水县土城古镇,当地人纷纷向笔者讲述当年的往事:“演出时,台上的演员还向当年的孩子们撒铜钱。有上百的青年看了演出后十分激动,当场报名参加红军。”87岁的老奶奶李昌玲还唱起了当年的民谣:“红军干人心连心,鱼儿和水永不分。红军爱民如亲人,千人永远念红军。”

其实,参加长征的女红军“个个都不简单”。心中只有别人的“永远的大英雄”蔡畅,“拼了命也要保护军委领导”的智勇双全的康克清、身患重病坚持长征的邓颖超;为了完成重任搁置张闻天求婚的“小麻雀”刘英,拉着马尾巴过雪山的邱一涵,怀着身孕偷偷长征的曾玉、麇战河西走廊的吴仲廉……她们的名字和血染的风采,永远铭刻在人们的心中。

在波澜壮阔、空前绝后的中国革命洪流中,女红军们用可歌可泣的英雄壮举,表现出了追求独立、向往自由的妇女解放精神,不怕牺牲、勇往直前的彻底革命精神,互相帮助、团结战友的阶级友爱精神,先人后己、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精神。

女红军不愧为时代骄子,不愧为“女神”。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